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90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太阳石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朱景冬等译



I731.15
PS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太阳石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朱景冬等译

漓江出版社

01.1871
21

(桂)新登字03号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太 阳 石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著

朱景冬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6 字数303,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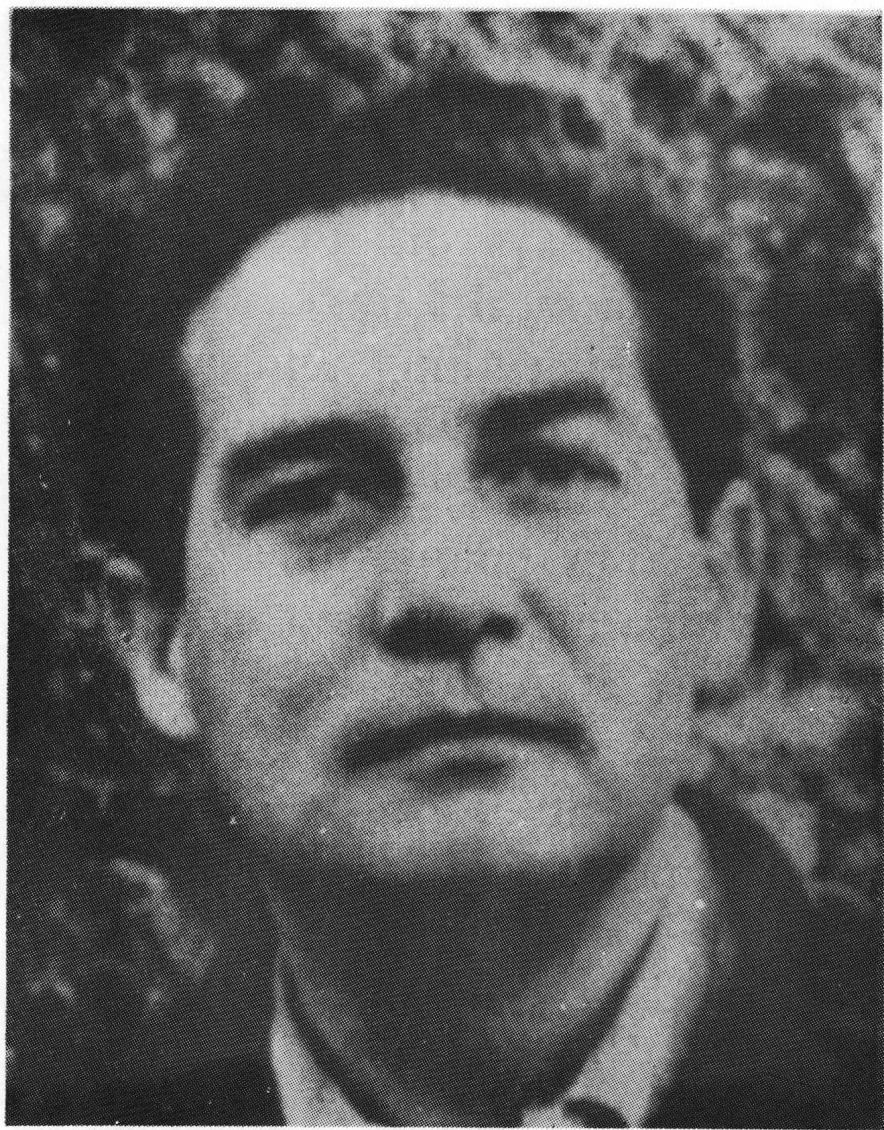
印数: 1—8,800 册

ISBN 7-5407-0857-2/I·600

定价: 平 装 6.95 元
彩盒精装 12.45 元

371

昭片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
(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过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 2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袁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拉丁美洲新诗歌的一面旗帜

朱景冬

奥克塔维奥·帕斯·索洛萨诺(Octavio Paz Solozano, 1914—),墨西哥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政论作家,在当今拉丁美洲和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对帕斯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说他的作品“洋溢着激情,视野广阔”,“表现了完全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创作成功地“将拉美大陆的史前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融为一体”。

1914年3月31日,奥克塔维奥·帕斯生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郊区的米斯夸克小镇。帕斯原籍为墨西哥西部的哈利斯科州。祖父伊斯内奥·帕斯是作家和自由派记者;父亲是律师,

曾参加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民主革命，担任起义军领袖萨帕塔驻美国的代表。帕斯曾回忆说：“我祖父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印第安人特征的墨西哥人。外祖父母是安达卢西亚人，母亲出生在墨西哥。”“那时我们住在一幢有花园的深宅大院里。我们的家庭已开始败落，由于革命和内战而陷于贫困。家里到处是旧家具、图书和什物，家境日趋破落。”

童年的帕斯受过天主教的熏陶。他曾进法国人办的一所马利亚教友派学校读书。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宗教教育一度使他染上了不可抗拒的“宗教热”。他和别的孩子一样去教堂望弥撒，参加圣餐仪式和其他宗教活动。当他想到历史上那些不信教的哲学家和可敬的英雄被判下了地狱时，不禁恐惧万分。所以，他担心他的好祖父能不能得救，要是被判下地狱，那就太悲惨了。但是帕斯的宗教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回忆说：“我终于感到厌倦了。这是魔鬼最强大的武器……弥撒那么长，布道那么乏味，我的信仰开始冷却了。我腻烦了。这种情绪便是对神明的亵渎，因为我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我还想念女孩子们。教堂已经变成愈来愈下流的梦幻的源泉。那些梦幻使我的怀疑情绪日益强烈，进而使我产生了对神明的怒火。有一天我走出教堂，再一次感到圣餐仪式对我没有益处。于是我在地上啐了一口，仿佛要把圣饼退回去似的，接着又在痰迹上跳了一阵儿，骂了两句，向上帝发出了挑战。从这天起我便信奉了具有斗争性的反自然神论。”

少年时代的帕斯跟他祖父一样酷爱文学读物。祖父的藏书室收藏着许多西班牙语作家的优秀作品，帕斯在那里接受了最早的文学和文化的熏陶。那时他就读完了西班牙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十卷本系列小说《民族轶事》，作品所叙述的形象化的现代西班牙历史和作者所刻画的萨尔瓦多·蒙德卢德等

生动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刻在帕斯的脑海中，直到老年他还记忆犹新。帕斯对诗歌的喜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除了在祖父的藏书室里读诗外，他还阅览诗歌报刊，以“敞开门窗，让世界文化的新鲜空气进入墨西哥”为宗旨的《现代人》杂志吸引住了他。1930年8月号上刊登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使他着迷，他一连读了三遍，后来还读了这首诗的原文。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这首诗始终是帕斯心目中的一座刻满符号的方尖碑，并没有因为志趣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遗忘。这首诗严谨的结构、深远的视野、素材的繁多、完美的构思、形式的新颖奇特等等，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是由于帕斯对艾略特诗歌的热爱和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1988年他被授予“托·斯·艾略特”奖。

帕斯对文学事业的热忱突出表现在创办诗刊上。1931年，他才17岁，就和几位年轻朋友合作编辑学生刊物《楼梯扶手》，为文学新人开辟了一块园地。两年后，他又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另一份刊物《墨西哥谷地手册》。帕斯的第一本诗集《野生的月亮》中的诗篇，便是先在该刊上问世的。在以后的年月里，帕斯还创办了《车间》(1938)、《浪子》(1942)、《多数》(1971)、《回归》(1976)等文学刊物，通过刊物为促进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帕斯的政治热情也很早就表现出来了。1929年，只有15岁的帕斯就积极参加了为争取国立大学自治而爆发的学生运动。由于“煽动”学生罢课，帕斯被警方拘留了两天两夜，并且被禁止进墨西哥的一切校门。

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帕斯先后进圣伊尔德丰索中学(即国立预备学校)和墨西哥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1937年，帕斯放弃了大学学业，前往南方的尤卡坦创办劳动子弟学校，从事教育

工作。但是不久他便搁下了这一工作，在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和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推荐下，应邀参加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帕斯当时23岁，是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次西班牙之行，正值西班牙内战开始不久。留给帕斯最深刻最持久的印象当然不是他同作家们的交往以及关于文学与政治问题的讨论，而是西班牙的一切及其人民：“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了我小时候从读物和祖父母的讲述中知道的景色、纪念碑和石头；我同西班牙诗人结下了友谊……特别是接触到了战士、农民、工人、教师、青年男女和老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友谊这个字眼，就跟自由这个字眼一样宝贵……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躲在一个村子里，一个农民冒着飞机的轰炸跑到果园为我们摘甜瓜，并且拿出面包和酒坛来让我们分享。”此外，帕斯还曾到已经成为战壕和阵地的大学教室和图书馆访问，在一个大厅的隔壁就是敌人的驻地。在西班牙的耳闻目睹使帕斯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觉得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当一个普通公民太惭愧了。他萌发了参军和当政委的念头，只是由于未受过训练，没有介绍信和不被人理解，才未能如愿。但是，对他的政治观念和文学创作来说，这次经历却是一个转换点。他在这一年出版的诗集《人之根》、《在法西斯的炸弹下》和《在你清晰的阴影下》，都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关注人类的命运，赞颂真善美，批评伪恶丑，诗人的个性与社会责任感统一，从自我升向无我。

在西班牙的一个星期里，使帕斯难忘的另一件事是见到了用西班牙语写现代诗的三位重要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和维森特·维多夫罗。1938年回国后，帕斯又结识了流亡墨西哥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本杰明·贝雷、秘鲁作家塞萨尔·莫罗和担任法国驻墨西哥外交官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布

勒东。同这些人的交往使帕斯“睁开了眼睛，以惊异的目光看周围的世界：它既是本身也是别的”。1943年，帕斯获美国古根海姆奖学金，次年又获古本江奖学金，这使他有可能前往旧金山和纽约研究拉美诗歌，熟悉美国文学和美国绘画。他读的第一本美国诗歌是康拉德·艾肯选编的现代诗选，而最令他激动的是欣赏叶芝晚年的诗作。

1945年12月，帕斯被外交部派往巴黎任职。他本想到那里“参加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那是本世纪的盛大节日”！但是超现实主义吸引了他。他和布勒东参观了爱斯基摩人艺术展，听他谈论超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实践。但是帕斯之所以喜欢超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是哲学和伦理方面的原因。至于诗的实践和美学，他总是怀疑地看待下意识行为。他喜欢他们的另一原因是他们仍然完整地保持着破坏的、诗的和革命的古老观念。但是他发现，超现实主义作为诗学，作为艺术尝试，已经枯竭。帕斯还发现，在超现实主义中，总是存在着革命和启示之间的摇摆现象。是革命思想使得他亲近超现实主义的。而当他走出超现实主义时，他却具有了丰富的启示观念。对帕斯来说，超现实主义最难得、最富有吸引力的东西是想象、爱情和自由，因为这是能使世界变得神圣并使之变成真正的“新世界”的唯一力量。对超现实主义的这些理解和认识，可以认为是帕斯文学创作的另一个转换点。

在后来的年代里，帕斯曾相继出任驻日本、瑞士、印度等国的外交使节，并曾去东南亚、斯里兰卡、阿富汗等地旅行，参观访问，广泛接触了东方的古今文化。他研究过《周易》、佛经和老庄孔孟，读过一些中国和日本的文学，熟悉《红楼梦》的故事和人物，从英文译过若干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并醉心于谢灵运和陶潜的山水诗。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艾青和